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空间表征与伦理教诲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Ethical Education in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刘 畅 (Liu Chang)

内容摘要: 《威尼斯商人》的戏剧结构突出了威尼斯和 Belmont 两地的相互对立和交替，形成伦理立场截然不同的两大空间。男女主人公们历经空间变换与伦理身份的重塑，展现出与伦理环境密切而深刻的相互映射关系。这一过程更深层次地揭示了社会伦理身份的动态演变轨迹，促使角色们面临伦理困境并作出各自的伦理选择。莎士比亚通过空间表征的对比书写表明了鲜明的伦理立场，凸显了该剧欢乐而深刻的伦理教诲功能。

关键词: 《威尼斯商人》；空间表征；伦理身份；伦理选择；教诲功能

作者简介: 刘畅，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珠海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莎士比亚戏剧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Title: Th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Ethical Education of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bstract: The dramatic structure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ccentuates the dichotomy and alternation between two key spaces: Venice and Belmont. These spaces embody contrasting ethical stances, forming distinct spheres of moral representation. The protagonists undergo spat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reshaping of ethical identities, demonstrating a close and profound mutual mapp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This process reveals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social ethical identity at a deeper level, prompting characters to face ethical dilemmas and make their respective ethical choices.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Shakespeare elucidates a clear ethical stance, underscoring the play's joyful yet profound function as ethical instruction.

Keyword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instructional function

Author: Liu Chang is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519041, China).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hakespearean drama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theater (Email:67203444@qq.com).

作为莎士比亚最成功的喜剧作品之一,《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1596)深受读者和观众喜爱,学界亦从未停止过对《威》剧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这出喜剧主旨的理解,仍未超出几个老生常谈的命题:商业的冲突、人性的弱点、宗教的争斗、以及法律的公正¹,其批评的方法也不免流于俗套。在当下以跨学科文学研究重新检验文学经典作品的热潮中,《威尼斯商人》理应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空间叙事学交叉研究的对象。

一、双重伦理取向的空间书写

空间书写是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如社会空间理论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与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48)。莎剧中的空间,不仅是物理的,更是人文的,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容器,其中的伦理取向,就是被固化在这一空间中的人文内涵,并成为莎剧空间书写的重要表征。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设置了两个伦理空间,其一是现实中的丑恶伦理空间。这个空间以混乱不堪、尔虞我诈、世态炎凉为基本伦理表征。剧中的威尼斯城,毗邻大海,商业繁荣,但莎士比亚却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以明丽的色调描绘尼斯城的繁华。戏剧开场,威尼斯的商人安东尼奥和几个朋友“闷闷不乐”地出现在街头,这些上层人物内心压抑、忧愁烦恼、郁郁寡欢的真实原因是,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担忧:安东尼奥算计着自己的商船是否能满载而归;夏洛克谋划着如何使他的高利贷生意一本万利;他的女儿杰西卡则核计着与未婚夫席卷家财一起逃走;连他的仆人朗斯洛都盘算如何尽快逃离主人。他们是这座城市中尔虞我诈、自私逐利的代表,折射出现实中威尼斯人贪婪的本性。这就是商业之城威尼斯的伦理基调。表面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背后却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因为它是整个威尼斯社会现实伦理空间的真实表征。

《威尼斯商人》中的另一伦理空间,是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提出的“绿色世界”(弗莱 247)——贝尔蒙特。贝尔蒙特是与充满残酷争斗的丑恶现实伦理空间相对应的美善理想伦理空间。这个空间神秘而

1 参见 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文学评论》6(1963):78-113;王忠祥:“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华中师院学报》4(1983):135-141+148;杨林贵、黄培希:“夏洛克女儿的财富——‘后’学话语中的莎剧小人物”,《外语与外语教学》5(2012):76-80;冯伟:“《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与权力哲学”,《国外文学》1(2013):125-132等。

充满诗意，充溢着生命的气息、青春的欢乐和爱的涌动。这里是宁静欢乐之所，是谈情说爱的空间，人际间充满亲情和友爱，即使也有变故、忧伤和痛苦，但总能以温和的方式得到化解。例如第二场的“选匪成亲”以及最后一场“指环风波”，让大家在欢乐的笑声中彻底忘却了对安东尼奥的担忧，消解了凝重氛围。贝尔蒙特的空间爱和快乐的伦理规则，寄托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伦理追求，是作者对心中和平与宁静的乌托邦世界理想的建构。

威尼斯与贝尔蒙特空间相距甚远，奉行的是不同的伦理规则。莎士比亚通过伦理空间表征的揭示，彰显深刻的伦理考量与鲜明的价值取向，引导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思考财富、欲望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正是莎士比亚的空间意识在《威尼斯商人》卓越表达。

西方戏剧的叙事主体，往往通过空间的对比来表达叙事主体的伦理追求，以表明剧作者的伦理立场。《威尼斯商人》就是明证，作家通过威尼斯和贝尔蒙特的空间伦理书写，于褒贬中完成了伦理批判。正如弗莱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的戏剧行动从所谓产生于现实的“规范的世界”，展开并解决于理想的“绿色世界”（247）。实际上，拿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对比，是莎士比亚空间书写的一大特色。在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中，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相互对立的“两个空间”：一个是以城市或者宫廷为主导的“现实之城”，在这个世界中，世俗社会的伦理法则约束着人们的一切生活；另一个是远离尘嚣的绿色的“理想之城”，这是一个以森林、仙境组成的绿色世界。在这里，人们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就像“亚登森林”之于《皆大欢喜》，“温莎林苑”之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波西米亚、西西里”之于《冬天的故事》，以及“林中仙境”之于《仲夏夜之梦》。这种强烈的反差，是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呼唤着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回归自然和人性的伦理立场，蕴含着莎士比亚的伦理取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威尼斯和贝尔蒙特的空间书写，似乎远远超出了戏剧结构的技术意义，也超出了调动观众情绪的剧场意义。它超越了简单场景堆砌的范畴，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性格、揭示戏剧主旨的关键力量。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解读文本至关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其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伦理环境与语境中，让文学回归其本真的伦理土壤，以此确保对作品内涵的准确解读与评判。¹《威尼斯商人》的剧本结构严谨，五幕二十场戏精心布局，每一幕的编排，均彰显出作家对戏剧情节空间场景的深思熟虑与明确设定。莎士比亚巧妙地构建了双重空间场景——威尼斯城与贝尔蒙特，运用了更加灵活的叙事结构，在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展开了一种对位式对话。其中，有十二场戏设置在繁华的海上城市威尼斯，作为故事的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主要发生地之一，这里承载着丰富的商业活动与人情世故。而余下的八场戏则转移至贝尔蒙特，特别是“神秘的鲍西亚家宅”，这一场景不仅增添了剧情的神秘色彩，也促进了情节的高潮迭起。如此布局，使得《威尼斯商人》的空间叙事在“海上城市威尼斯”的喧嚣与“神秘的鲍西亚家宅”的静谧之间自如穿行，两者相辅相成，引导观众（或读者）在空间的转换中，深入体验剧情的跌宕起伏与人物的心理变化。两个故事发生地，是不同风格的物质空间，象征着相互对峙的两股力量、两个阵营、两类人物和两种氛围。威尼斯就是人们生活的现实之地，也是历史上真实的著名地中海商业中心，早已具有完备的法律和社会运行体制。反观贝尔蒙特，则并无实际的地理考证能为它提供“身份证明”，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伦理之所。

莎士比亚的空间书写就此可以精妙地勾勒出一条“威尼斯”至“贝尔蒙特”，再返“威尼斯”，终至“贝尔蒙特”的流动路线。在此，两大主要戏剧场景的动态流转，不仅仅是空间表征的更迭，而是深刻蕴含着伦理取向、认知的演进与意义的多重解读。

《威尼斯商人》中的“威尼斯城”与“贝尔蒙特”，这两个原本静态的空间场景，在作家笔下被赋予了深刻的伦理内涵，成为独特的空间表征。这一建构，既是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也是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生动再现。

二、复杂伦理身份的空间变换

《威尼斯商人》的空间架构错综复杂，剧中三位主角穿梭于不同的伦理身份之间，这些身份随着空间场景变换与时光流逝而不断演变。人物身份的动态演变，空间的更迭，深刻影响着角色间的人际关系、伦理定位乃至个体形象的塑造，进而左右其伦理抉择与命运轨迹。随着莎士比亚“空间生产”¹意识的巧妙融入，这些场景成为了一条连贯的叙事线索，引领观众穿越伦理关系的迷雾，见证角色们在不同伦理空间中的身份建构。诚如江守义所言，“时间和空间的运用对故事的形态和伦理价值均有影响，时空的差异会让故事的伦理意味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或弱化”（154）。

首先，威尼斯城的现实空间建构了亦信亦善的安东尼奥伦理身份。《威尼斯商人》的核心伦理议题，围绕犹太商人夏洛克与基督教商人安东尼奥之间“契约之辩”展开，遵循着商业之城形成的契约伦理。作为《威尼斯商人》中的威尼斯商人代表，安东尼奥是莎士比亚精心雕琢的道德典范，他展现了高度的伦理自觉与对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循，是一位充满理性的光辉形象。此外，在宗教文化影响的友爱伦理规范下，他还是剧中另一位核心角色巴萨尼奥的挚友，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为剧情增添了丰富的情感色彩。安东尼奥出于友情，为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就婚姻，向以高利贷著称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借

¹ 参见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志弘译、包亚明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58页。

贷三千金币。夏洛克提出了一项苛刻的条款，若借款未能如期偿还，则安东尼奥需割让一磅自身之肉作为偿付。然而，安东尼奥的商船遭遇了意外延误，致使他无法按期偿还债务。夏洛克则坚持按照契约的规定，要求安东尼奥履行其中的割肉条款。在莎士比亚的喜剧殿堂里，友谊与爱情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它们如同坚固的伦理桥梁，连接着每一个社会个体，构成了维系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石。安东尼奥，这位莎士比亚笔下的道德楷模，以他对友情的深切珍视和无私奉献著称。他对待朋友，总是展现出无比的慷慨与真诚。对于试探其友谊的言语，他淡然以对：“您是知道我的为人的，现在您用这种譬喻的话来试探我的友谊，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1.1）。这句话揭示了安东尼奥对友谊的看重，他愿意为朋友付出一切，包括金钱、时间和精力，甚至生命。安东尼奥的慷慨不仅仅停留在言语上，他借钱予人从不计利息，更时常在他人困境中伸出援手，排忧解难。尤其对待挚友巴萨尼奥，他的付出更是毫无保留，即便这意味着自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乃至生命危险，他也毫不退缩。当巴萨尼奥面临前往 Belmont 求见鲍西娅的困境时，安东尼奥毅然决然地表示：“我一定凭着我这一点面子，能借多少就借多少，尽我最大的力量供给你到 Belmont 去见那位美貌的鲍西娅”（1.1）。这番话，不仅是对友情的坚定承诺，更是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颂歌。

其二， Belmont 的理想空间建构出鲍西娅亦智亦勇的伦理身份。这一空间的伦理底蕴建构，则主要在自由、友善、包容的空间生产中完成，彰显了《威尼斯商人》的浪漫主义色彩。鲍西娅这位 Belmont 的温婉动人的富家千金，通过剧作家巧妙的“女扮男装”手法，被赋予了全新的伦理身份——化身为才华横溢的鲍尔萨泽律师，踏上威尼斯的法庭，不仅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挚友安东尼奥于生死边缘，同时以行动回报了丈夫的恩情，并收获了美满的婚姻，这一切都彰显了她非凡的伦理智慧与策略。在莎士比亚的笔下，鲍西娅被精心塑造成通过“换装”实现伦理身份转变的关键角色，她的这一创举不仅深刻影响了剧情的发展轨迹，更引领着故事走向了皆大欢喜的浪漫结局。可以说，若无鲍西娅的介入，夏洛克与安东尼奥之间的纠葛，将陷入不可挽回的悲剧深渊。中国学者曾高度评价鲍西娅，称她为“一位集德行与才智于一身，洋溢着浪漫主义情怀的 Belmont 新女性典范”（王忠祥 21）。她深信“慈悲乃公道之调和剂”，认为慈悲的力量能够引导人弃恶向善，其道德高度甚至凌驾于权力之上，是接近神性的一种美德。若世人皆能秉持此“利他”之心，则幸福将遍洒人间。鲍西娅作为 Belmont 的富家女，遵照父亲意愿，用金、银、铜做的三个匣子，分别装上骷髅、傻瓜的画像、她本人的画像，求婚者如果相中她本人的画像便可与她喜结良缘。结果其他求婚者均错选落败，只有巴萨尼奥选中，两人终成眷属。这表明她接受了传统婚姻伦理中的父权伦理秩序：“她的父亲为她选择夫君，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女儿拱手相让于他看中的年轻男子”（贝文顿 51）。就在此时，鲍西娅突然得知丈夫的好朋友——威尼斯

商人安东尼奥陷入债务的纠纷。她决定前往威尼斯解救安东尼奥。可是作为一名没有社会身份的女性，鲍西娅到底该如何进入法庭，又如何说服公爵大人的呢？莎士比亚巧妙地通过“女扮男装”的喜剧手法，成功完成了鲍西娅伦理身份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将大家闺秀化身为年轻有学问的律师，借以顺利进入法庭，取得了法庭辩论的胜利，帮助自己的爱人成功解救了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

第三，“双城”空间建构了杰西卡的亦悖亦爱伦理身份。夏洛克之女杰西卡的身份建构，则逐渐形成于从威尼斯城到贝尔蒙特的空间流转过程之中。在《威尼斯商人》的叙事空间脉络中，杰西卡最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贝尔蒙特的旅程。那是一个与威尼斯截然不同的乌托邦，一个被赋予了“绿色世界”美誉的理想之地，它包容万象，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旅人，更成为了爱情绽放的温床。贝尔蒙特，以其独特的伦理氛围，颠覆了威尼斯的陈规旧俗，这里，法律与传统似乎都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恋人们纯真的情感与自由的灵魂。杰西卡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对所处威尼斯城的父权伦理禁忌的一次大胆挑战，两个空间对角色变换的伦理影响，是从“现实世界”迈向“理想乌托邦”（或是弗莱所说的“绿色世界”）的空间跨越。然而，在贝尔蒙特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她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受到惩罚或谴责，反而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喜剧性自省与救赎。这不仅仅是因为空间上的迁移，让她远离了旧有的束缚，更是因为贝尔蒙特所倡导的伦理观念，让她得以重新审视自我，理解到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并非建立在对既有规则的盲目遵从之上，而是源自内心的真实渴望与勇敢追求。

夏洛克、安东尼奥、鲍西娅和杰西卡等人的故事，成为共同构成作品主旨的深刻诠释：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伦理中，个体应当勇于探索自我，追求内心的真实与自由。而贝尔蒙特，作为这一理念的象征性空间存在，不仅为杰西卡提供了逃避现实的理想王国，更为人们开启了一扇通往自我救赎与成长的大门。

三、伦理教化功能的空间实现

在现实伦理框架内，个人的伦理身份不仅是社会物质空间中的身份标识，更承载着与之相应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威尼斯商人》有其特定的空间设置，“正是空间才使得一个故事不仅仅是故事：在时间的绵延中，故事所给予我们的只是结局；而在空间的状态下，故事才真正成为一个过程”（徐岱 267），而这种设置对戏剧的整体伦理倾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里，剧中人物因伦理身份的多样与相互交织，展现了人性深处丰富多彩的面向，善与恶的伦理冲突构成了情节张力与人物对立的核心驱动力。莎士比亚深刻描绘了各种人物内心善恶并存的复杂状态，以及他们在这一伦理天平上不断进行的选择与斗争。

作为正面人物的代表，巴萨尼奥的多重身份是他面临了伦理选择的困境。他既是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好朋友，又是富家女鲍西娅的爱人。一面是不顾一切对富家女的爱情追求，一面自己的好友安东尼奥为了他却吃上了官司。他同样也遇上了伦理两难，究竟是维护来之不易的爱情，还是义无反顾挽救友情？巴萨尼奥的伦理抉择表明，在他心中，与安东尼奥的友情占据着更重要的位置：“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4.1）。巴萨尼奥与好朋友安东尼奥经历生死考验的感人友谊，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试图向人们证明和谐的社会关系常常依靠爱与友谊维系。莎士比亚歌颂爱情和友谊的同时，谴责残忍的行为。面对冷酷无情的异教徒的夏洛克坚持要以割掉安东尼奥的一磅肉作为补偿的要求，莎士比亚给予了“威尼斯商人”无比的同情，对夏洛克的残酷、虚伪的“恶”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作为反面人物的夏洛克在剧中非第一男主角，却是构成伦理冲突的唯一对立面。他展现了一个复杂且多维的伦理面貌，既是公众眼中凶狠吝啬的犹太商人，又是私底下令人心生同情与怜悯的失败父亲。一方面，夏洛克以高利贷商人的伦理身份，对基督徒安东尼奥天生缺少理解与同情。他一心想完成犹太民族复仇的伦理责任与义务，表现出凶狠残暴、自私贪婪的一面。此时他人性中的兽性因子占据了上风，是他任由自身自由意志控制理性意志的伦理选择结果：“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住他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1.3）。另一方面，夏洛克作为长期饱受歧视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对人生而平等的渴望：“他憎恶我们神圣的民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说那些都是盘剥得来的腌臢钱。要是我饶过了他，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1.3）。《威尼斯商人》自诞生起，便富有强劲活力，不仅成为宣扬人文主义道德理想的宣言，还在于基督教虚伪的宗教伦理规范的辛辣讽刺和对于资本主义商业伦理的功利性质的无情揭露。故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来讲，夏洛克有值得同情之处，从宗教的立场来讲，他的出路只有改宗。莎士比亚以为，二者统一在慈悲与博爱精神之上，其实仍是表现出他内心的偏见。这恐怕是作为基督徒的莎士比亚所无法克服的矛盾。基督教理想给了莎士比亚福音，宗教立场又使他陷于一种困境”（陈惇 63），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作为剧中富有争议的女性形象，杰西卡的伦理选择同样经历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挣扎。在光鲜亮丽的借贷商人之女与渴望自由恋爱的少女之间，杰西卡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却也在这两者之间不断拉扯。在“卷逃私奔”的决定性时刻，杰西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的双重伦理身份——夏洛克之

女与罗兰佐的挚爱，成为她难以摆脱的重负。作为夏洛克的女儿，她本应是家族荣耀与利益的守护者，但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却让她无法忽视罗兰佐的存在。这种双重身份的拉扯，不仅考验着她的个人意志，也映射出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份与角色的严格界定。她深知，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将是一段荆棘满布的旅程。若选择继续留在父亲身边，虽然可以保持家族的体面与自身的安全，但她的心灵将永远被压抑的爱情所困扰；而若选择私奔，追随内心的爱情，她将背负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背叛之名，承受无尽的舆论压力与内心的煎熬。在这场伦理的较量中，杰西卡所展现出来的勇气与决绝，不仅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更是对当时社会伦理规范的一种无声反抗。她深知自己的选择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但她仍然勇敢地迈出那一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由与独立。相比哈姆雷特在复仇之路上的延宕与挣扎，杰西卡的抉择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光辉，她让我们看到了在伦理困境中，一个女性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自由与幸福。她选择以逃离威尼斯的方式与自己家庭孝道、宗教仪轨彻底决裂：“唉，我真是罪恶深重，竟会羞于做我父亲的孩子！可是虽然我在血统上是他的女儿，在行为上却不是他的女儿。罗兰佐啊！你要是能够守信不渝，我将要结束我内心的冲突，皈依基督教，做你的亲爱的妻子”（2.4）。万幸的是，莎士比亚没有给杰西卡选择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而是十分果断地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伦理选择，使得戏剧结局得以朝着喜剧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不幸悲剧的发生。

通过对戏剧的空间表征的对比书写，与剧中人物伦理身份的不断建构与解构，莎士比亚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引导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深刻反思伦理、正义与人性之间的微妙关系。随着全剧空间场景的流转，角色们面对伦理选择的困境并作出各自的伦理选择，从中凸显了《威尼斯商人》的伦理教诲功能，带给读者深刻的道德启示。

在《威尼斯商人》的戏剧舞台上，从威尼斯到 Belmont 空间表征的交织更迭，体现了作家伦理取向的鲜明立场。作为文艺复兴末期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剥离了威尼斯城外部世界的偏见与纷争，努力守护住内心那份对天真无邪、和谐圆满的深切渴望，为在世俗伦理重压下挣扎的灵魂开辟了一条通往心灵净土的路径。剧中男女主角穿梭于威尼斯的繁华与 Belmont 的神秘之间，这一空间上的流转，不仅是物理位置的移动，更是他们内心伦理世界重塑与碰撞的生动展现。随着剧情的推进，男女角色在空间的变换中不断探寻、质疑并重新定义自己的伦理身份，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伦理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构筑起一个充满张力与冲突的伦理场域。这一过程展现了人物伦理身份的动态演变，深刻地触及了戏剧的核心——即在复杂多变的伦理困境中，个体如何面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伦理期待，做出道德上的抉择与牺牲。

Works Cited

- 大卫·贝文顿：《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谢群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 [Bevington, David. *Shakespeare: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Xie Qu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 陈惇：“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从《威尼斯商人》说开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1995）：57-63。
- [Chen Dun. “Shakespeare and Christianity: Starting fro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5 (1995): 57-63.]
- 冯伟：“《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与权力哲学”，《国外文学》1（2013）：125-132。
- [Feng Wei. “Philosophy of Law and Power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3): 125-132.]
- 诺思罗普·弗莱等：《喜剧：春天的神话》，傅正明、程朝翔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
- [Frye, Northrop et al. *Comedy: The Myth of Spring*, translated by Fu Zhengming and Cheng Chaoxiang. Beijing: China Theat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 江守义、刘欣：《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
- [Jiang Shouyi and Liu Xin.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Eth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16.]
-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志弘译、包亚明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58页。
- [Lefebvre, Henri. “Space: Social Products and Use Value.” *Modern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Wang Zhihong, edited by Bao Yaming.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3. 47-58.]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威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集》（二），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95页。
-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II),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4. 1-95.]
- 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文学评论》6（1963）：78-113。
- [Wu Xinghua. “The Merchant of Venice: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Literary Review* 6 (1963): 78-113.]
- 王忠祥：“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2006）：18-31。

[Wang Zhongxiang. "Constructing a Sublime Moral and Ethical Utopia: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Shakespeare's Play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06): 18-31.]

——: “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华中师院学报》4 (1983): 135-141+148。

[—: "On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4 (1983): 135-141+148.]

徐岱: 《小说叙事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Xu Dai. *Narrative Studies in Fic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2.]

杨林贵、黄培希: “夏洛克女儿的财富——‘后’学话语中的莎剧小人物”, 《外语与外语教学》5 (2012): 76-80。

[Yang Lingui and Huang Peixi. "The Wealth of Sherlock's Daughter: Small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s Drama in the Discourse of 'Late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5 (2012): 76-80.]